



汉唐乐府中的 民俗因素解析

刘航[®]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唐乐府中的民俗因素解析

刘航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乐府中的民俗因素解析/刘航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8343-0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乐府诗—诗歌研究—中国—汉代~唐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9096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5JC750.11-44045)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6BaWY009)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项目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唐乐府中的民俗因素解析

刘航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343-0

2011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3/8

定价: 46.00元

目 录

绪论

- 选题缘由 3
- 研究现状述评 10
- 主要内容与研究意旨 13

上编 乐府人物考论

- 刘生、王昌考 19
- 莫愁故事演变的三部曲 29
- 西子经典形象的形成与袂褻之俗及魏晋隋唐之女性观 40
- 张女考 59
- 从何满子传说看中晚唐的怀旧现象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67
- 《神弦歌》考论 83
- 老胡文康考 106

中编 乐府诗模式化意象与情节杂考

- 城南——情爱与战争的方位符号 115
- 乐府诗中的花卉、花果与情爱 124
- 折柳、折花赠远的形式与功用 140
- 衣带与汉唐婚恋习俗 154

下编 乐府诗与民俗文化综论

民俗文化与乐府诗主旨的形成和变异 163

水嬉与汉唐乐府诗 179

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及演变的影响 224

《文康乐》与汉魏六朝戏剧艺术的发展 239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75

绪论

选题缘由

民俗，是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类型化的生活现象。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文化，民俗产生于群体生活的需要，并为这种需要服务。每一个生活圈都必然存在被这一生活圈中的绝大多数成员^①所认同的游戏规则（亦即相应的民俗），以此来调适这个群体的生活。^②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论是文学创作抑或文学研究，都不可能脱离民俗这一人人无所遁逃的生活文化。〔美〕雷·韦勒克（Rene Wellek）、奥·沃伦（Austin Warren）曾说：“很多基本的文学类型及主题都起源于民俗”^③，“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④。由于西方民俗学被引入中国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的，因此，中国民俗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国民俗学自诞生伊始，文学作品就是民俗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文学与社会背景之关系的考察日益受到重视，并涌现出一系列前沿性课题和新的学术热点，文学与民俗的交叉研究作为其中之一，益发受到重视。^⑤

对乐府诗进行全面深入的民俗学研究，既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重要性、特殊

① 例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就曾指出：“某些个体由于先天气质缺陷、早期意外经历和异质文化作用影响，与既定文化格格不入，致使这些个体对现有社会文化价值表示怀疑，并认为是不真实的、靠不住的、甚至是荒谬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

② 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体，往往并非仅仅属于一个社会群体。

③ 〔美〕雷·韦勒克（Rene Wellek）、奥·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页。

④ 《文学理论》，第106页。

⑤ 参见吴相洲、刘航：《文学的多重发生：与政治、音乐和民俗的关系》，高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性以及研究现状的薄弱性所要求和决定的,也是乐府研究向更深广的方向拓展的必然结果。乐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其创作历时久远,从狭义来说,在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汉唐;就广义而言,宋元明清的文人拟乐府绵绵不息,数量既夥,且不乏精品。深入认识这些作品,无疑可推进对文学史的理解。

虽然民俗作为观照文学的独特视角越来越广受重视,但此类交叉研究若非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特性的认知与把握的基础上,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却研究的意义。汉唐乐府中的民俗因素之所以值得用力考察,是因为乐府诗很早便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汉至南北朝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所采集或编制用来入乐的歌诗是乐府诗的两大来源之一,这些作品大多来自民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风俗民情,而“观风俗,知薄厚”也是汉代乐府机关采集歌诗的重要目的之一。^①倘若以当代民俗学者的眼光来看,乐府诗与民俗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从乐府诗曲名、本事、主题、人物、表现手法、风格到功能、传播、发展、演变,无不与民俗息息相关,下面便约略言之。

曲名与民俗:不少乐府曲名具有特定的民俗意义,如《拜新月》^②、《踏歌行》、《踏歌词》^③、《拔楔曲》^④、《折杨柳》^⑤、《结爱》^⑥、《祠神歌》^⑦、《竞渡曲》^⑧、《斗鸡篇》^⑨、《新乐府·时世妆》^⑩等。

题材与民俗:民俗是乐府诗的重要题材之一,除了一些曲名与民俗有关^⑪的诗歌之外,还有不少乐府诗以民俗为主要内容,或者针对民俗而发。前者如《七日夜女歌九首》写牛郎织女故事,元稹《估客乐》、张籍《贾客乐》、刘禹锡《贾客词》写商人习俗,无名氏《沐浴子》写以香草和水祓除之俗,孟郊《游子

①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东汉)班固:《汉书》卷三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六册,第1756页)]

② 女子拜新月并祈祷。

③ “踏歌”,即踏地为节的歌舞,有单独踏歌和众人连臂踏歌两种形式,是古时很盛行的娱乐方式。

④ 拔楔之俗,即驱除不祥的巫术活动,详见下编《水嬉与汉唐乐府诗》。

⑤ 折柳枝以祈求得到爱情或祈愿远行之人归来,详见中编《折柳、折花赠远的形式与功用》。

⑥ 打结以祈求远行之人归来或爱情美满,缘于古人对打结的信仰。

⑦ “祠神”,即祭祀神灵。

⑧ 赛舟游戏。

⑨ 斗鸡游戏。

⑩ 时髦的化妆。

⑪ 曲名与民俗有关,并不意味着歌辞必然关乎民俗。

吟》写为游子密密缝衣之俗，王建、张籍《北邙行》写素幕绕铭旌、唱挽歌、魂车祖马送葬、坟前立碑及石羊石虎、寒食送纸钱等丧葬和祭奠习俗，温庭筠《乐府倚曲》中的《鸡鸣埭歌》、《雉场歌》抨击六朝皇室沉溺于射雉游戏。《竹枝词》与民俗的关系尤为密切，它本为民歌，内容以艳情为主，偶亦咏及巴楚风土，而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及《竹枝词二首》里，却有近半数的篇章以风俗为题材。^①由于这些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遂使《竹枝词》几成文人吟咏风俗的专用体裁。^②甚至连一些曲名和主题均与民俗无关的乐府诗，也可能以民俗为题材或者有相当的篇幅涉及民俗，如白居易《新乐府·黑潭龙》通过乡民祭祀神龙的供品尽为林鼠山狐所享的故事，指斥贪吏之害，其中“黑潭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③等诗句所描写的，正是当时司空见惯的民俗现象。显然，这种写法更容易达到“见之者易喻”^④的效果。“采诗以考风俗”的做法及其对诗人创作理念的深远影响^⑤，是许多乐府诗针对民俗而发的重要原因，如《洛阳令歌》、《束皙歌》、《田使君歌》等，都是百姓因地方官祈雨成功而作的颂歌，在白居易《新乐府》中，《海漫漫》“戒求仙也”^⑥、《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⑦、《杏为梁》“刺居处奢也”^⑧、《草茫茫》“惩厚葬也”^⑨。此外，某一题材如果在一段时期大量涌现，往往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汉乐府中有不少描写弃妇的诗歌，如《上山采蘼芜》、《白头吟》等，正是汉代出妻成风的折光，周寿昌云：“汉法，以无子出妻为常律，若在后世，骇人听闻矣。又汉时颇多夫妇之狱，如冯衍两出其妻，黄允附

① 《竹枝词九首》其一“白帝城头春草生”、其三“江上朱楼新雨晴”、《竹枝词二首》其二“楚水巴山江雨多”写当地的踏歌之俗，《竹枝词九首》其五“两岸山花似雪开”写春日踏青，其九“山上层层桃李花”写生产习俗。（《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0—251页）

② 参见拙著《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第四章第三节《“惟闻唱竹枝”与风俗专用诗体之滥觞》，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23—228页。

③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册，第256页。

④ 白居易《新乐府·序》，《白居易集笺校》，第一册，第2136页。

⑤ 中唐力主恢复周代采诗制度的论调随处可见就是一个显例。

⑥ 《白居易集笺校》，第一册，第149页。

⑦ 同上，第208页。

⑧ 同上，第243页。

⑨ 同上，第254页。

贵出妻，范升为出妻所控被系，几困于狱。殆一时风气使然。”^①

意象、情节与民俗：〔法〕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曾经说过，民间故事具有两重性质，“它是令人惊奇地形式纷繁、形象生动、色彩丰富；同样，它也出人意外地始终如一、重复发生”^②。与民俗文化关系紧密的乐府诗也具有类似的两重性质。即便在文人拟乐府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由于文学传承重视前代经典以及写作惯性等原因，造成了情节的模式化；文学作品主题的表达离不开语言模式，而语言模式在文学中常常表现为惯例化了的意象，此类意象模式在中国古代抒情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经常出现在乐府诗中的模式化的意象和情节，有相当一部分与民俗有关。

主旨与民俗：乐府诗的主旨并非如古人所言，仅仅取决于本事或古辞，民俗文化对乐府诗主旨的形成、传承、变异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事非止一端且存在矛盾时，主人公的身份、故事情节等方面与民俗文化契合度较高的本事，往往成为大多数诗人创作的依据。既无本事亦无古辞的乐府诗，主旨也可能相当集中，在其中起凝聚作用的往往是与乐曲来历有关的民俗文化。因题命辞的创作方式，使得诗人常常从曲名所蕴涵或能够涉及的民俗内涵里衍生出新的主旨，与乐府诗演唱关系密切的民俗活动也有可能导致乐府诗主旨的变异。

风格与民俗：对乐府诗来说，风格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某一乐府诗往往有其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其重要标志。当乐府诗失去音乐的依藉后，更是如此，许多拟乐府诗创作，实质上就是对以前作品风格的模仿。时代风气、地域风俗、表演习俗等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乐府诗的风格。例如吴声西曲经常运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是六朝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的折光^③；清商曲辞中有大量的方言俗语，除了“依”、“欢”之外，还有“百际”（如“内心百际起”^④）、“底”（如“约誓底言者”^⑤）、“阿那”（如“布帆阿那起”^⑥）、“落

①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三七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442页。

② 〔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Claude）著，陆晓禾、黄锡光译：《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③ 参见王运熙《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68页。

④ （无名氏）《懊侬歌十四首》其五，（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六“清商曲辞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二册，第668页。

⑤ （无名氏）《懊侬歌十四首》其六，《乐府诗集》卷四六“清商曲辞三”，第二册，第668页。

⑥ （无名氏）《懊侬歌十四首》其八，《乐府诗集》卷四六“清商曲辞三”，第二册，第668页。

托”(如“落托行人断”^①)等等,显然是受当地方言的影响;清商曲辞多以女子的口吻,是由演唱者一般为女子的习俗所决定的;^②《棹歌》、《采菱》、《采莲》等的艳情色彩一向非常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水嬉活动是滋生此类乐府诗的温床,无论是少女们靓妆出场并娇声婉转地倾吐着相思之情,还是诗人们对此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皆出于水嬉的双重需要——祭祀和娱乐。^③

乐府人物与民俗:乐府诗中的人物有不少属于神灵或传说人物,如王子乔、渔山神女、井公、白石郎、青溪小姑、刘生、王昌、木兰等,他们本身便是民俗的产物。即便实有其人,在其形象的演变中,也往往积淀着民俗文化的因子。例如西施之所以演变为浣纱女,并出现她在吴宫采莲为乐的传说,就与苧蓢之俗有很大关联。浣纱是水畔苧蓢的主要方式之一,且与女性的关系极为密切;采莲则是苧蓢娱乐化的产物——水嬉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众多女子都曾经被附会为浣纱女或采莲人,但由于西施传说更贴近浣纱和采莲的民俗内涵,最终成为经典。^④

乐府诗的功能与民俗:不少乐府诗在民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接为特定的民俗活动服务。从《晋白紵舞歌诗》“清歌徐舞降祇神”^⑤可知,《白紵舞》是迎神之曲;曲水流觞时,常常要唱《回波乐》;送葬时要唱《蒿里》、《薤露》等曲子,皆为其例。

乐府诗的传播与民俗:某一乐府诗兴盛与否,不但与时代风尚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所体现的民俗内涵被接纳的广度、深度或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的流行程度。前者如《竹枝词》,最晚到隋朝,它就诞生于巴渝,但是在中唐以前,并没有被广泛传唱,更不曾引起文人的关注。在至少被冷落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竹枝词》蓦然青云直上,不仅在民间和歌楼锦筵时时可闻,也很受诗人的青睐。前后判若云泥的遭际,与竹崇拜观念在中唐的风行有直接的关系。^⑥后者如《棹歌行》,自六朝以还,绵绵不绝,以至于有“从来入弦管,

① (无名氏)《懊侬歌十四首》其十,《乐府诗集》卷四六“清商曲辞三”,第二册,第668页。

② 参见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第400页。

③ 参见下编《水嬉与汉唐乐府诗》。

④ 参见上编《西子经典形象的形成与苧蓢之俗及魏晋隋唐之女性观》。

⑤ 《乐府诗集》卷五五“舞曲歌辞四”,第三册,第798页。

⑥ 参见拙著《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第四章第三节《“惟闻唱竹枝”与风俗专用诗体之滥觞》及所附的《竹枝词考》。

谁在棹歌前”^①的盛誉。边泛舟游玩边欣赏棹歌的娱乐方式极为盛行，致使歌辞的需求量居高不下，是诗人们热衷创作《棹歌行》的重要原因。^②

乐府诗的发展与民俗：既然乐府诗的曲名、题材、主旨、风格等诸多因素都与民俗有许多瓜葛，民俗对乐府诗的发展演变产生巨大影响就毫不足怪了。例如着力挖掘乐府曲名中蕴含的风俗内容，是中唐乐府诗革新的重要思路。以张籍、王建为代表的中唐诗人，不仅仅满足于详尽地描述风俗本身，还力图展示出主人公的民俗心理，以精到的心理描写，发展、深化了汉乐府的叙事艺术。^③

乐府诗与民俗发生关联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说以上所言皆是乐府诗与民俗的天然联系，那么古人的诠释则为乐府诗与民俗之间增添了一条人工脐带。有些乐府诗原本与民俗毫无关联，由于被认为是某一事件的预兆，也就与民俗产生了瓜葛。这些乐府诗除了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的大量童谣和其他一些歌谣（如《黄獐歌》、《庾公歌》、《御路杨歌》、《黄昙子歌》、《历阳歌》、《邯郸郭公歌》、《齐云观歌》等）之外，还有不少，例如清商曲辞中的《桃叶歌》、杂曲歌辞中的《舞媚娘》、舞曲歌辞中的《晋杯槃舞歌》、近代曲辞中的《堂堂》等。需要注意的是，被当作谶语的乐府诗并不一定产生在所“预兆”的事件发生前夕，例如《桃叶歌》、《舞媚娘》、《堂堂》等的产生时间与它们所“预兆”的事件相距甚远^④，所以说乐府诗与民俗产生关联不一定是即时的。

并不只是民俗文化单向地影响乐府诗，由于乐府艺术是千载间满足社会各阶层娱乐需要的主要途径，它本身已成为当时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会从多角度、多层面民俗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乐府艺术在人物传说的产生、发展、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少频繁出现在诗文和民间传说中，影响深远的人物（如王昌、刘生、木兰等）诞生于乐府诗；无论实有其人抑或纯属虚构，是否有乐府诗专咏其人其事、这些乐府诗的人乐入舞情况、曾否被著名的歌者演唱过、被著名的舞者表演过、歌辞能否唤起读者兴趣并为读

① 梁简文帝：《櫂歌行》，《乐府诗集》卷四〇“相和歌辞十五”，第二册，第594页。

② 参见下编《水嬉与汉唐乐府诗》。

③ 参见拙作《对风俗内涵的着意开掘——中唐乐府的新思路》，《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④ 《桃叶歌》相传是东晋王献之送别爱妾桃叶时所作的，却被当作陈朝灭亡之兆，陈后主时已有《舞媚娘》、《堂堂》，却被认为是武则天做皇后及代唐的先兆。

者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人物（尤其是入乐府诗之前尚不为人们熟知的人物）传说的流布；由于题目、主题相近的乐府诗有时会在内容上相互吸纳，从较早出现的具有想象空间的歌辞里经常衍生出新的情节，诗人的虚构等因素，在乐府诗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经典的人物形象。^①又如某种民俗活动的盛行虽然是促进相关乐府诗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乐府诗对相关民俗活动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羊侃自造《棹歌》之曲、隋炀帝幸江都时命龙舟殿脚女手执雕板缕金楫站在舟前的舞台上歌舞等花样百出的泛舟游乐方式的出现，就与《棹歌行》的风行不无关系。

乐府诗与民俗的关系错综复杂，以上胪列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但从上所述已足以看出，若要准确把握乐府诗的特点，民俗这一视角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必须尽可能地将乐府诗放在它赖以产生的民俗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内部机制的变化。审视乐府诗所涉及的各种民俗事象，揭示它们深刻的内在渊源，有助于解决某些单从文本出发难以破译的问题；从民俗角度关注乐府诗，能够加深对乐府诗文学特征、艺术表现手法的理解，拓宽乐府研究的视野；乐府诗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民俗的载体之一，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民俗文化，亦可为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研究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因此，乐府诗的民俗学研究不仅对乐府研究而言，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对其他文学史和文体史的研究也不无参考意义。

① 参见下编《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及演变的影响》。

研究现状述评

乐府诗与民俗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民俗视角恰恰是乐府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尽管乐府诗歌的民俗研究起步甚早，发展却非常缓慢。除了受制于民俗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较晚^①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以吴声、西曲为代表的一大批民间作品在古代一直被视为淫靡之辞，不被学者重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些诗歌恰恰与民俗的关系最为紧密，如果将它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乐府诗的民俗学研究至少是很不完备的。真正意义上的乐府诗民俗研究始于 20 世纪上半叶，与其他体裁的古代诗歌和民俗的交叉研究一样，乐府诗民俗研究基本呈零散状态。在 1982 年出版的《唐声诗》中，任半塘首次明确提出“探索诗调与民俗间之关系”^②的研究方向，并对唐代声诗（相当于《乐府诗集》中的近代曲辞）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考察，标志着乐府诗民俗学研究走向自觉。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人文学科内部的交叉渗透已成为令人瞩目的思潮，民俗作为观照文学的独特视角越来越广受重视，乐府诗民俗学研究更是多角度、多层次地铺展开来。迄今为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乐府诗文本所蕴涵的民俗（如乐府诗内容、本事所反映的民俗，乐府诗中具有民俗内涵的意象和情节，乐府人物传说，民俗对乐府诗题材、主旨、艺术手法的影响等）。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对元白乐府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的探究^③，洪顺隆

① 作为专门学科术语的“民俗”一词，是英文“Folklore”的意译。1846 年，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将撒克逊语“folk”（民众）与“lore”（知识）合而为一，创造了“Folklore”（民众知识，民众学问）这个新词，以取代当时常用的“Popular antiquities”（大众古俗）。

② 《唐声诗·上下编简介》，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上册，第 1 页。

③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从六朝民歌看原始阿注婚残迹》^①、吕美生《论李白乐府〈杨叛儿〉与“女神崇拜”》^②、朱炯远《王建〈促刺词〉与“长住娘家”的民俗》^③等，都是对乐府诗内容和本事所反映的民俗事象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主题学研究的兴盛，通过辨析乐府诗意象和情节的民俗内涵，还原文本意义的做法颇为盛行。如纪永贵《采桑主题与采莲主题比较论析》^④对乐府诗的两个重要主题——采桑和采莲不同寓意的分析，拙作《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民俗学问题》^⑤对“瓶沉簪折”与古代的水崇拜、井崇拜和视簪为自身之象征等观念之关系的论述皆是如此。另外，有些论著虽然研究对象并不仅限于乐府诗，但所考察的意象和情节在乐府诗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可视为广义的乐府诗民俗研究，如宣炳善《“井上桐”的民间文化意蕴》^⑥、王立《柳与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物我关系一瞥》^⑦、金金南《同心结风俗考辨》^⑧、高莉芬《春会的仪典象征——“邂逅采桑女”的文学原型分析》^⑨、诸葛忆兵《“采莲”杂考——兼谈“采莲”类题材唐宋诗词的阅读理解》^⑩等。

乐府人物考，如王运熙《吴声西曲杂考》对子夜、碧玉、莫愁等人物的考证，《神弦歌考》对《神弦歌》所祭祀的神灵的考索^⑪，夏振明《莫愁试考》^⑫等。相关论著数量不多，学术进展有限。

清代朱乾《乐府正义》^⑬笺释乐府诗时，已比较注意考订诗中的事实和背景，但未注意吴声、西曲的有关史实。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⑭首次关注社会背景对六朝乐府题材、主题、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影响，如论汉乐府《陇西行》与汉朝陇西地区强悍的民风、论魏左延年《秦女休行》与东汉末年私人

① 《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4期。

② 《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③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④ 《池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⑤ 《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

⑥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

⑦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⑧ 《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

⑨ 《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

⑩ 《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⑪ 《乐府诗述论》（增补本），第44—101、169—184页。

⑫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3期。

⑬ （清）朱乾：《乐府正义》，稻香堂藏版，乾隆五十四年朱珪刻本。

⑭ 此书最早由中国文化服务社于1944年在重庆印行。

复仇之风的盛行、论晋张华《轻薄篇》与晋代贵游子弟和士大夫的放诞生活、论南朝清商曲内容与当时上层阶级思想和生活的关系等，“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①，其所论述，往往核实精当，阐述之深入大大超越前人；此后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②也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的，二者皆堪称乐府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与乐府诗表演有关的习俗，包括演艺圈习俗、演出方式的民俗渊源等。如赵敏俐《汉代社会歌舞娱乐盛况及从艺人员构成情况的文献考察》^③、《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④，钱志熙《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⑤，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⑥，拙作《竹枝词考辨》^⑦等。此视角起步虽晚，近年来却颇受瞩目。

三、乐府诗的传播、演变与民俗。如宣炳善《李白〈静夜思〉的民俗学阐释——兼论乐府传播的民俗机制》^⑧、拙作《对风俗内涵的着意开掘——中唐乐府的新思路》^⑨等。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

总的说来，乐府诗民俗研究虽不乏佳作，却远未成熟。这首先体现在研究视野的狭窄上，即便是最受关注的“文本与民俗”，也存在一些研究盲点，例如乐府诗涉及的人物众多，未曾弄清的为数不少，但除了莫愁等极少数人物之外，鲜有问津者。深度亦颇不足，多为平面化的探讨或史料的搜集堆砌，例如《唐声诗》下编“尽量探索诗调与民俗间之关系”^⑩，筚路蓝缕之功虽不可没，但正如任半塘先生自言，“仅史料之集丛而已”^⑪。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也未发生根本改观。总之，乐府诗民俗研究尚有广阔的开拓畛域。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②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 《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⑤ 《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⑥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⑦ 《国学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民间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⑨ 《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⑩ 《唐声诗·上下编简介》，《唐声诗》，上册，第1页。

⑪ 《唐声诗·序》，上册，第1页。